

前言

向蘇聯學習，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是目前我們祖國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課題。為此，我們特將『蘇聯糧食生產發展的途徑』、『蘇聯的國營農場建設』、『蘇聯機器拖拉機站的發展及其生產業務的領導』和『托羅依茨基專家在全國農業工作會議畜牧小組會上的談話』等四篇材料，介紹出來，編印成冊，以供各級農業生產幹部業務學習的參考；希全體同志，認真學習，深入體會，結合當地具體情況，好好的來運用，為搞好農業生產，支援工業建設，貫徹總路綫而奮鬥！

廣東省人民政府農林廳

一九五四年二月

蘇聯糧食生產發展的途徑

中央農業部蘇聯顧問 A·K·布尼亞克專家在全國農業工作會議上的報告

蘇聯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期中（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糧食問題是黨和政府面臨着的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之一。

糧食問題的實質就是要消滅糧食生產發展的速度遠落後於工業發展的速度的現象。斯大林同志曾說過：『使糧食生產趕上工業發展的速度，並且把糧食生產發展的速度提高到保證國民經濟，工業與農業迅速向前發展的水平』（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二五八頁）。

一九二五年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公佈的列寧—斯大林關於國家工業化的政策，保證了按擴大再生產的法則而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急速地上漲。由於社會主義工業高速增长的结果，工人的數量不斷地增加着，城市在不斷地擴建中，同時新的工業中心和生產工業原料作物（如棉花、亞麻、糖用甜菜等）的地區亦在不斷地擴大着。所有上述這些情形，再加上國內糧食一般需要量的增加，就使得商品糧食需要額迅速地增長起來。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蘇聯糧食的生產量幾乎完全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但是這個時期中商品糧食生產的增加，正如斯大林所說的『慢得要命』（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八二頁）。一九二七年商品糧食的產量僅為一九一三年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一九二八年僅達其

百分之三十六點八。

斯大林同志在『在糧食戰線上』這篇報告中很詳盡地指出了糧食困難和糧食生產極端落後的原因，並指出了克服這種落後情況的途徑。在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所發表的這篇報告中曾指出，我們糧食生產已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而商品糧却少於戰前的原因：『這首先和主要是因為在十月革命發生後，我國農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已由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多的巨大地主經濟和巨大富農經濟，過渡到了商品糧食出產量極少的小農經濟和中農經濟。戰前我國有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六百萬個體農戶，而現在我國却有二千四百萬至二千五百萬農戶——單是這一點就已說明現在我國農業底主要基礎，是商品糧食出產極少的小農經濟』。

接着斯大林同志又指出：『巨大農莊，不管它是地主農莊也好，富農農莊也好，或是集體農莊也好，其所有的長處，就是它能採用機器，利用科學成績，採用肥料，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它能出產最多的商品糧食。反之，小農經濟所有的弱點，就是它沒有這種可能性，或幾乎沒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它是半消費性的經濟，商品出產量很少的經濟』（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第十一版，一九三頁，外文出版局中文版二六六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以前，在俄羅斯，地主每年「生產」的六億普特（註一）糧食中，商品糧佔二億八千一百六十萬普特。一九二六——二七年蘇聯已沒有地主農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富農生產糧食十九億普特，其中商品糧佔六億五千萬普特，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富農農莊生產糧食六億一千七百萬普特，其中商品糧僅佔一億

二千六百萬普特。另一方面，雖然中農和貧農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生產了四十億五千二百萬普特的糧食（戰前每年生產的糧食為二十五億普特），但是他們提供的商品糧僅有四億六千六百二十萬普特，比戰前減少了百分之三點五。

由於沒收了地主農莊，富農的糧食生產縮減了三分之二，而小農經濟的比重則擴大了，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中小農經濟所提供的商品糧食僅佔其生產量的百分之十一點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地主提供的商品糧佔其生產額的百分之四十七，富農所提供的佔其生產額的百分之三十四）。因此，商品糧的產量比一九一三年顯著地減少了。『毫無疑問的，讓糧食生產所處的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那麼蘇聯的軍隊和城市居民就會陷於經常挨餓的境地。這會是糧食生產的危機，在這種危機後面，一定會有畜牧業的危機跟着發生』（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二七四頁，外文出版局中文版三五三頁）。當然，蘇維埃國家在這個時期中，由於商品糧生產減少所發生的困難，祇是暫時性的，這種困難是能克服的。事實上，在農業合作化，建立農業機器拖拉機站及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國營農場的基础上，這種困難已被克服了。

糧食生產的危機是什麼呢？

糧食生產的危機表現於，按照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的法則而極迅速發展的大型社會主義工業與落後分散的小農經濟間的矛盾，因為小農經濟甚至連實現簡單的再生產都不能。

資產階級分子，首先是富農，曾利用國家在糧食戰線上的困難，企圖破壞蘇維埃的經

濟政策。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非常的措施以反對富農。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粉碎了人民敵人的怠工及反抗，在政治上鍛鍊了勞動農民，訓練與組織他們進行農村中偉大的革命——在全面合作化的基礎上把富農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它。

斯大林對解決糧食問題特別重視，把它看作是解決所有其他農業問題的關鍵。

斯大林於一九三〇年在敘述糧食問題的意義中曾指出：『糧食問題是整個農業體系中的基本環節，因為不解決糧食問題，就不能解決牲畜（小牲畜和大牲畜）問題，也不能解決為工業供給主要原料的技術作物和特用作物的問題』（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一九六一九七頁）。

由於蘇聯迅速地解決了糧食問題，因此才能保證國家有足夠充分的糧食貯備，以備個別地區遇到歉收時的需要以及供應蘇聯國防和出口等的需要。

黨在解決糧食問題時，曾與資產階級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布哈林派進行過無情的鬥爭（托洛茨基——布哈林派企圖在蘇聯農村中復辟大型資本主義的富農經濟，以期將黨推向滅亡之路）。如果黨不採取這個路線，那就會造成正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完全離開列寧主義，而投奔到工人階級底敵人方面去』（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第一九六頁外文出版局中文版二六九頁）。

在黨和蘇聯政府面前擺着一個如何擺脫這既已造成的情況的問題。斯大林同志根據列寧的農業合作化的學說，特別清晰並正確地指出了我國農業的出路。

第一個出路，就是把個體的分散的小農經濟聯合為大規模的、有機器設備的、以現代

化科學武裝起來的、而能生產大量商品糧食的公有農莊。

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所舉行的聯共（布）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認為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的條件已經成熟，加強集體農莊運動的領導，乃是增加我國商品糧食生產的重要措施之一。

第二個出路，就是要擴大和鞏固現有的國營農場，在空閑的土地上建立和發展大型國營農場。

第三個出路，就是要不斷地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的單位面積產量，並把它引向合作制度的軌道上去。

這個任務是在我們黨的第十四和十五次黨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

斯大林同志繼續指出，如以比較現代化的犁來替換目前在田間使用的五百萬張木犁，那麼農民的單位面積產量，在幾年以內便能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此外，還有以化學肥料、純淨的種籽、小型機具等供應農業上的需要，也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挖掘潛在力的手段。簽訂預購合同，與整村整鄉訂立關於供給他們種籽及其他等，同時要他們交出相當數量糧食的合同。這是提高農民的單位面積產量和吸引農民加入合作制的最好方法。『只要執行這一切任務，那麼經過三、四年以後，我們國家就會擁有二億五千萬至三億普特（譯者註：中文版為二億至二億五千萬普特，與原文不符。）的新增商品糧食』（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一八九頁。外文出版局中文版二七二頁）。

按照斯大林的英明計劃和在他的領導之下，實現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樣才使蘇

維埃國家解決了糧食問題。還在一九三〇年，聯共（布）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就已指出：『黨在以社會主義工業為領導、聯合落後的分散的小農經濟組織成集體農莊，並在幫助中、貧農個體農民經濟的基礎之上，基本上勝利地解決了糧食問題』（聯共（布）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年代裏，社會主義成分已在農業中佔絕對優勢，特別是在糧食生產方面。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由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二點三提高到一九三二年的百分之七八點六，其中小麥的播種面積由百分之二點九到三二年增加至百分之九〇點六。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末期，曾建立了二二五個穀物國營農場，它們擁有現代化的機械裝備，全部播種面積三百二十萬公頃。（註一）

並在這些年代裏（一九二八—一九三二）組織了二十一萬個集體農莊，到一九三二年底已有一千四百七十萬戶中，貧農（佔中貧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五）被組織到這些集體農莊中去了，他們集中了佔農民總播種面積百分之七十五的土地，而交售給國家的糧食則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七點三。因此蘇聯就成為世界上具有最大規模農業的國家了。

農業機器拖拉機站在發展集體農莊的糧食生產上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在此時期中農業機器拖拉機站在國內糧食作物地區獲得了普遍的發展。其數量在一九三〇年為一五八個，至一九三三年底已增至二千九百十六個。到農業改造的末期（一九三三年），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田野上已有二十萬台拖拉機（註三）（共有三、二〇九、〇〇〇匹馬力）、二萬五千台康拜因（註四）和大量的其他機具在工作着。在採用科學方法和機械化的基礎之

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經營管理的加強和他們足夠的先進技術裝備，為進一步地提高糧食和農業其他部門的生產創造了條件。

在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基礎上，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播種面積增加了二千一百四十萬公頃，其中糧食播種面積佔七百五十萬公頃，在增加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中，冬小麥和春小麥佔六百九十萬公頃，居主要的地位。

一九三〇年全國糧食的總產量已達五十億一千二百萬普特，而一九二七年為四十七億四千二百萬普特，革命前最豐收的一九一三年為四十八億零六百萬普特。

蘇聯的商品糧食，在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發展的基礎上，也有了顯著的增加。如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國家收購的商品糧食為五億三千萬普特，而一九三一—三二年度交售給國家的則有十四億普特，其中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生產的商品糧食已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而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生產的商品糧，在收購的糧食中僅佔百分之六。

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一月所作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中曾指出：『黨所達到了的成績，就是他現在已能每年採辦十二億至十四億普特穀物，而在個體農民經濟佔主要地位的那個時期，每年祇能採辦五億至六億普特的商品糧食』（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一九一頁）。

蘇聯在集體農莊制度勝利和鞏固以後，每年生產的糧食，都超過革命以前俄國一九一三年所達到的最高水平。

一九三五年的糧食總產量達五五億普特。但是這仍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國家日益增長的要求。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在男女康拜因手會議上有歷史性意義的報告中講過關於進一步增加糧食生產的問題：『我們應當想到明天，想到最近的將來，如果從明天看起來，那末我們所達到的成績，還是不能滿意的。所以我們現在就必須採取適當的方法使糧食生產一年一年的增加起來』（斯大林在先進的男女康拜因手會議上的演說：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下冊，中文版七三〇頁）。

斯大林同志指出，蘇聯的農業具有一切條件和可能來完成這個任務。這個條件和可能就是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佔了統治地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有着肥沃的土地、先進的技術以及精通技術的幹部。

斯大林的這些有歷史意義的指示便成了蘇聯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和農業機器拖拉機站在進一步發展糧食生產方面一切工作的依據。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在莫斯科召開了一個糧食豐產勞模、先進的拖拉機手和打穀機操駛者以及黨政領導幹部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各地的代表一千二百多人，他們都是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田間工作最高指標的獲得者。有成百的工作隊長、集體農莊主席在會議上作了關於一九三五年每公頃收到糧食作物一五〇——一八〇普特產量和關於每台拖拉機和脫粒機超出工作定額百分之一百——二百的報告。到一九三六年許多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都已超過了這些指標，而在這些農場裏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更高了。

大量擴充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機械設備，採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增加工業原料作物，特別是多年生牧草的播種面積，這就提高了農業的耕作水平，因而也就保證了農業的主要部門——糧食生產——產量的增長。

隨着農業機械設備的革新，在農業中高度勞動生產率的標誌——拖拉機手、康拜因手的技術水平也提高了。一九三五年康拜因手波拉顧金（С. В. ПОЛАГУИН）首先以一季的時間收割了一、〇〇五公頃，而到一九三七年時就已經有四七九個收割一、〇〇〇公頃以上的康拜因手了。一九三七年康拜因手坡林（К. А. БОРИН）以其駕駛的一台康拜因收割了二、〇〇〇公頃的糧食作物。加里寧曾經對這著名康拜因手的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寫道：「經過坡林康拜因糧箱的穀物最少有十八萬普特，假定說坡林每天收割七十五公頃的話，則他以一台康拜因就能代替九五〇個人、一五〇匹馬、三七台風車、二〇台畜力脫粒機的工作」（加里寧：「蘇維埃政權以什麼給了勞動人民」一九三七年二十一頁）。

由單純擴大播種面積轉到改進糧食作物的栽培技術和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機械設備的改革，這樣就保證了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和總產量有計劃的增長。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糧食作物單位面積產量是超額完成的。在一九〇三——一三年糧食作物每公頃平均單位面積產量為七點四公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二八——三二年）的平均單位面積產量是七點五公擔，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一九三三——三七年）是九點一公擔，而一九三七年的糧食作物單位面積產量則達到一點五公擔，並且全國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集體農莊每公頃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達到十二公擔以上。

戰前各集體農莊和各國營農場在為完成斯大林關於提高糧食生產的指示所展開的社會主義競賽的過程中掀起了糧食生產先進分子的熱烈運動，他們在爭取完成糧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成就。在全國各集體農莊中湧現出糧食豐產模範的先進工作隊。在西部西伯利亞（阿爾泰邊區）形成了耶夫立莫贊夫勞模的豐產運動。在阿爾泰邊區，安德立夫區波利托吉拉集體農莊謝爾吉娃（А.С.СЕРГЕЕВА）採用了根據當地條件仔細研究出來的農業技術，於一九三九年獲得了小麥每公頃一〇一公擔的產量。這是在社會主義農業條件下獲得的世界最高的產量。在伏爾加河流域（斯大林格勒省）的集體農民們廣泛地開展了為爭取在大面積上每公頃獲得不低於一〇〇普特（合中國每畝二〇八、四市斤）產量的運動。

基於先進的蘇聯農業生物科學的成就，在幾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裏，糧食作物不僅推移到了很遠的北方和東方，甚至在過去從不栽培小麥、黑麥、燕麥的北極圈外和中亞細亞各地區現在也已栽培了。在蘇聯東部和非黑土地帶已建立了龐大的糧食基地，因此就有可能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地區內大大地增加商品糧的生產。

根據第三個斯大林五年計劃第十八次聯共（布）代表大會規定了發展糧食生產的基本任務在大會決議中寫着：「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末期在糧食作物方面每年要保證收穫八十億普特，每公頃的平均單位面積產量要達到十三公担」（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結論一九三九年二十二頁）。

社會主義農業機械設備的增加和農業技術水平的提高保證了計劃的完成。一九四〇年

一月一日農業機器拖拉機站的數目達到七、〇六九個，農業機器拖拉機站有拖拉機四十三萬五千台，康拜因十五萬三千台，載重汽車四萬輛，自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一年訓練了四百萬左右的機務人員，其中拖拉機手為二百六十萬人，康拜因手五十五萬人，拖拉機工作隊隊長十四萬五千人，汽車司機以及其他專門人材等二十二萬三千人。一九四〇年百分之七十五的春季播種前的田間工作，百分之八十四的休閒地的耕地，百分之七十二的秋耕地的耕地是用拖拉機的動力來完成的，半數以上的麥類作物是用康拜因收割的。農業機器拖拉機站用拖拉機完成的工作總量在一九三三年為三千五百二十萬公頃，而至一九四〇年已達到二億二千三百五十萬公頃。

在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中日益廣泛採用先進的農業技術，例如秋耕休閒，用複式犁深耕滅茬，根據李森科的方法進行種籽的春化等；同時良種對於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也同樣是有很大的作用，一九四〇年良種播種面積的比重達到了百分之八十四；一九四一年春多年生牧草的收割面積則超過了一千三百六十萬公頃，但是飼料作物的總面積則超過了一千八百萬公頃。由於耕作水平日益提高，採用正確的草田輪作就有了可靠的基礎。所有這些都使糧食生產不斷的提高。

一九四〇年偉大衛國戰爭前夕，蘇聯糧食總產量已達到一億一千九百萬噸（或七十二億普特）其中小麥的生產水平為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二四八。同年蘇聯生產了三千八百三十萬噸或二十三億普特的商品糧，較之一九一三年增加了一千七百萬噸的商品糧。每公頃的平均產量達到十點七公担。而先進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產量則遠遠超過此數。

在一九四〇年全蘇農業展覽會上有二三四個區，一八一六〇個集體農莊和九五七個國營農場，它們的糧食作物的穩定產量每公頃達到十五——二〇公担以上。順利地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發展糧食生產的任務為德國法西斯強盜背信義的進攻所中斷了。

社會主義農業組織的偉大優越性在一九四一——四五年偉大衛國戰爭年代裏表現得特別明顯，那時商品糧的需要大大地增長了。有計劃地組織生產，這就使得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在戰爭艱苦的年代裏對軍隊和全國人民糧食和其他產品的供應沒有嚴重地間斷過。顯然，若沒有集體農莊的制度，若沒有男女集體農民奮不顧身的勞動，我們就不能解決這個極困難的任務。」（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一九五一年第五版一一七頁，中文版一九五〇年外文出版局一〇一頁）。

自戰爭開始以後，糧食生產和蘇聯整個國民經濟一樣都服從於前綫的需要。共產黨和蘇聯政府鑑於重要糧區暫時被敵人所佔領，就在東部加速發展糧食作物，因此在新區一九四二年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較之一九四一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二十三，遠東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卡查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增加了百分之十七。

在戰爭的年代裏德國法西斯強盜使蘇聯的農業遭到很大的損失，嚴重地損害了糧食生產。戰爭快結束時，播種面積縮小，單位面積產量下降，糧食和其他作物的總產量減少。一九四五年收復區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只有戰前水平的四分之三。此外，全國各重要糧區在一九四六年即和平建設的第一年又受到嚴重的旱災，因此就嚴重地阻礙了戰後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進一步發展以及蘇聯人民福利的進一步增長。

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提議，一九四七年聯共（布）二月全體會議，通過了「關於戰後提高農業的措施」這一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在全體會議的決議中提出了迅速恢復和進一步提高全國農業的規模宏大的綱領，這一綱領規定在三年內（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把糧食作物總產量恢復到戰前水平，並在五年計劃結束時大大地超過這一水平。

戰後五年計劃的年代裏，供給了集體農莊、國營農場五十三萬六千台拖拉機（每台折合成十五匹馬力的），九萬三千台穀物康拜因（其中三萬九千台為自動康拜因），三十四萬一千副拖拉機牽引的犁，二十五萬四千架拖拉機牽引的播種機，二十四萬九千架拖拉機牽引的中耕器以及其他大量的土壤耕作機器、播種機器以及收割機器。在戰後五年計劃的年代裏農業機器拖拉機站的拖拉機總牽引力增加了五百萬匹馬力以上。電動脫粒站的數目也增加了。一九五〇年已經有了一萬四千台電動脫粒機在工作。這種脫粒機的勞動生產率較之畜力脫粒提高了四點五倍。

農業機器拖拉機站在提高糧食生產方面的作用是在不斷地提高着。糧食生產的機械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一九五〇年休閒地和秋耕地的耕地工作的機械化就已超過了百分之九十，用拖拉機牽引的播種機播種的面積約達百分之七十，用穀物康拜因收割的佔全部播種面積的大半。蘇聯設計家設計的完善的農業機器和農具大批地送到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這些機具保證了糧食生產和農業其他部門操作的全部機械化。

在戰後五年計劃的期間進行了鞏固固定生產工作隊的工作，把這種工作隊作為集體農莊基本的唯一正確的勞動組織形式。這件工作在充分利用拖拉機康拜因和其他機器方面是

有很大的意義的。同樣集體農莊的合併對於糧食生產和農莊整個經濟進一步高漲也具有很大的意義。集體農莊的合併乃是在先進的科學和技術的基礎上不斷提高和多方面發展集體農莊經濟的極其重要的條件。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全國共有二十五萬四千個集體農莊，到一九五二年已合併為九萬五千個了。

由於黨、政府和全體人民的努力，糧食生產在戰後的第三年就已經恢復到了過去的水平。自一九四八年起全國糧食總產量超過了七十億普特，而一九五二年達到八十億普特，而小麥的總產量則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以前認為是最尖銳、最嚴重的問題——糧食問題就這樣順利地解決了，而且是徹底而永遠地解決了」（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一九五二年四十八頁中文版：人民出版社四十六頁）。

根據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五一——五五年蘇聯五年發展計劃的指令，預計五年內糧食總產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十五，其中小麥增加百分之五十五——六十五。

毫無疑問，蘇聯人民將會順利地完成這個規模宏大的糧食生產計劃。

順利地解決糧食問題和不斷地進一步提高蘇聯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的生產對於大力發展農業的其他部門，首先是畜牧業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關於農業技術指導和宣傳工作的幾點意見

一、不久以前我們偕同中央農業部楊副部長瞭解了河北省基點和農業技術指導站工作的許多農業技術人員的實際工作。必須這樣說：這些直接在農家、合作社和國營農場工作

的農業技術人員在當地黨政領導下從事着與國家與農民與農場有利的巨大的工作。

在基點和農業技術指導站工作的技術人員正執行着黨和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從現有農業技術與農民生產知識出發，依可能辦到的事項從事研究，以便幫助農民對於糧棉各項主要生產事業有所改良，達到增產的目的」。他們實地研究了比較完善的播種前的土壤耕作制度，播種量、灌溉量、植株密度、施基肥和追肥、棉花整枝、合理防治病蟲害等方法，並局部地推廣到他們工作的農家、合作社和國營農場中去。

但是，農業技術人員的工作面還是較窄的，他們只限於研究個別作物，主要是棉花的個別農業技術，而沒有把當地主要糧食作物和工業原料作物的綜合農業技術措施包括在內。因此，工作的效果也是很有局限的，不能根本地促進農業生產全面的提高。

農民、合作社和國營農場的領導幹部把這些農業技術人員當作自己的老師，先進農業技術問題方面的親密助手。因此必須擴大農業技術人員的農業技術活動，使他們主要去大力地提高糧食作物和工業原料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和增加這些作物的總產量。

只有合作社、國營農場和農家廣泛地採用綜合的農業技術措施，才能完成這個重大的任務。

爭取增產的工作必須從現在就開始，利用短短的冬閒廣泛地向國營農場、合作社的領導幹部和農民進行農業技術知識的宣傳，組織他們學習糧食作物和工業原料作物增產的農業技術。

學習先進的農業技術時，必須較廣泛地利用當地農民中好的經驗，此外，用實物圖表

等材料來組織學習農業技術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利用畫片、圖表、圖解、實物、放演電影等，假如條件許可的話能組織直接到田間去學習農業技術，例如示範深耕、中耕、播種和其他等等那就更好了。

這是國家很重要的工作，所以一切農業技術人員，無論他是那裏工作的，都應該參加這個工作。為了避免在這個重要工作上發生無人負責的現象，最好將農業技術人員長期的固定於一定的國營農場、合作社和農村中（鄉、村、莊等）。這樣農業技術人員就可與所負責的農場、社、村建立經常的業務聯繫，這對農場、社、村以及技術人員都有好處，由此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各個技術人員的工作成績。

農業科學研究所、試驗場、農業學校、實習農場等在農業技術的宣傳方面應發揮更大的作用。它們應當真正地成為高度農業技術的發源地。因此，它們在農作物的產量上和畜牧業的生產率方面都應當是示範性的農場。

現在全國共有二、一四四個省、專區、縣農場，和一六六所農業學校，共有一二、〇〇〇個受過高等和中等教育的農業專家在那裏工作着。這是一批很大的力量。他們除完成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外，可以在對附近國營農場、合作社和農民宣傳農業技術和畜牧技術知識上，給予我們巨大的幫助。

我們認為最好給試驗場，農業學校固定一定的村莊，由他們負責進行經常的農業和畜牧業的技術指導，這個補充力量，能使現有的農業技術指導站在對國營農場、合作社和農民在農業和畜牧技術問題上，更好地更充分地為他們服務。